

1847 年羅孝全對洪秀全的印象與影響

詹恩勝*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摘 要

羅孝全 (I. J. Roberts, 1802-1871) 為十九世紀美國浸信會 (American Baptist) 來華傳教士，以其曾為洪秀全的宗教導師及與太平天國的特殊關係而著名。1847 年，羅孝全曾指導洪秀全研習基督教義，其間羅孝全對其印象頗佳，並認為他所陳述之異象類似天使的感召。雖然洪秀全學道的時間僅有二月餘，但這些經驗對日後太平天國宗教的內涵與儀式，曾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本文首先將追溯羅孝全來華初期的傳教活動，並探索他對洪秀全在廣州學道期間的印象，以及對洪秀全在宗教方面的影響。

關鍵字：羅孝全、浸信會、洪秀全、太平天國

*通訊作者. Tel. : 02-25788955 • 02-25798477

E-mail address : taipateh@seed.net.tw

壹、前言

十九世紀美國社會由於受到第二次大覺醒運動和基督復臨論等宗教觀的影響，宗教活動趨於蓬勃發展。基督徒深信為迎接基督千年王國的來臨，必須積極宣揚基督精神，引導更多人信仰上帝，而許多新教的海外佈道組織也因此相繼成立。此種致力於在世間宏揚基督福音與造福人群的精神，對於來華的美國傳教士曾造成相當的影響，他們努力在中國傳播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的理想，期望最終能改良中國社會。當時身為浸信會牧師的羅孝全，即於美國第一波海外宣教的熱潮中，在 1830 年代自願前往中國傳教。

羅孝全與太平天國的關係，最早可追溯至他在 1847 年指導洪秀全學習基督教義期間。目前學者對羅孝全與洪秀全的關係已有不少研究，但有關羅孝全在 1847 年對洪秀全的印象與宗教影響方面，仍值得重新探討，¹以釐清羅孝全與洪秀全的早

期關係以及上帝教思想的淵源。本文除參考十九世紀的教會期刊等原始史料外，並將參酌美國與兩岸學者的相關研究，期能對羅孝全的個人特質、傳教經歷，及其對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的初期印象與宗教影響等問題，有更為完整、客觀的認知。

貳、羅孝全的個人特質與早期傳教經歷

1802 年 2 月，羅孝全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桑穆納縣（Sumner County）的農村，其家庭生活的宗教色彩十分濃厚，在十九歲時即決心成為一位傳道人，至 1828 年正式被按立為牧師。他在密西西比州宣教期間，深受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牧師在華的報導所影響，對於赴中國傳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達成此心願，他先後創辦「羅孝全基金會」（Roberts' Fund）和「密西西比谷地中國傳道會」（China Mission Society of the Mississippi Valley），作為對華傳教的後援組織。²但後來他在申請成為正式牧師與前往中國傳教的過程上曾歷經波折，因為他的情況和多數傳教士相較，家庭背景雖亦富含濃厚的宗教色彩，但在教育程度上明顯不及其他傳教士，且其個人修養亦曾受到不少質疑。然而，他對宣教事業的高度熱誠，則是有目共睹的。羅孝全的個性具有濃厚的冒險精神，但缺乏禮節與個人修養。他積極投入傳教工作，卻與家人逐漸疏遠，以致在身後他的兒女都

¹ 關於羅孝全與洪秀全關係之專題研究，包括茅家琦〈洪秀全與羅孝全〉；羅爾綱〈羅孝全傳〉；王慶成〈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考夫林（M. M. Coughlin）〈屋裡的陌生人：羅孝全與叔未士〉（*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普魯德（G. B. Pruder）〈羅孝全與太平天國時期的美國對華政策〉（*I. J. Roberts and U. S. Policy toward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等。然而，目前國內的著作在論及相關問題時，仍多認為羅孝全對於洪秀全在 1847 年所陳述之異象存有不良的印象，並以此點為造成羅孝全不願為洪秀全施行洗禮之因，至於洪秀全對基督教義的認知則主要來自梁發所撰之《勸世良言》，而在羅孝全教堂所習得之神學知識亦大致與此書相同。這些觀點固有其代表性，但仍有值得商議之處，本文試以王慶成等學者的研究成果為初基，擬對此提

出更完整的詮釋。

² 吳義雄，《在世俗與宗教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出版社，1997 年），頁 106-107。

放棄繼承財產的權利。此外，由當時西方人士與後世學者的評價，均可見其充滿爭議性的一面。羅孝全在還未脫離浸信會期間，許多與他共事的傳教士均曾在呈送差會的報告中表示難以與之相處或合作。例如叔未士(J. L. Shuck)牧師在呈送差會的報告中，即曾抱怨與羅孝全共事具有高度的困難性，因為在傳教上「他的動機固然頗佳，但是他的無知卻是令人難以形容的。」³1860年代曾加入太平軍行列的英國籍海軍軍官哈喇(A. F. Lindley)，甚至形容羅孝全「是一個缺乏堅定性格與和藹態度的人，偏狹和拘泥於浸信會的教條。」⁴而羅孝全此種獨特的性格與行事作風，也曾影響1847年前來向其學道的洪秀全。

1837年5月，羅孝全抵達中國後，最初在澳門傳教。在宣教工作上，他熱衷於獨自外出佈道和發送福音書籍，對於和另一位浸信會牧師叔未士之間的合作並無很高的熱誠。1841年他雖成為浸信會的正式牧師，但由於與差會中其他傳教士間的關係長期以來都頗為不睦，也為日後他被差會正式除名一事，埋下重要的伏筆。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後，羅孝全與叔未士相繼由澳門遷往香港發展。羅孝全最初被差會派赴香港南部的赤柱建立傳教站，在當地的英軍與中國居民之中展開傳教活動。但他有感於當地人口不多且發展空間有限，因此在未經差會的同意下，即逕自

離開赤柱。1844年，他主動要求前往廣州傳教，因而成為美國浸信會首位來到廣州的傳教士。次年7月，羅孝全在廣州東石角設立教堂，取名「粵東施蘸聖會」。除了自任牧師之外，另請美國籍的裨治文(E. C. Bridgman)、英國籍的吉勒司匹(W. Gillespie)與中國籍的梁發等傳教士擔任長老。此時叔未士因感在廣州傳教的潛力頗佳，又決定將香港的傳道團遷往廣州。此後廣州遂出現了兩個浸信會組織，使羅孝全與叔未士處於對立的局面。及至叔未士返美後，羅孝全與其他傳教士仍陷於新的紛爭之中。1845年，美國國內南北對立的情勢延伸至宗教界，造成美國浸信會分裂為南方浸信會與浸信會真神堂。在此情況下，曾與原差會關係不睦的羅孝全，即於1846年選擇加入美國南方浸信會。但不久後，羅孝全再度與南方浸信會陷於不合的局面，最終更導致被差會正式除名。當時美國南方浸信會陸續派遣克勞普頓(Samuel Clopton)、啤士(George Percy)、贊臣(Francis Johnson)與維爾登(W. B. Wilden)等傳教士到達廣州，但他們與羅孝全皆難以相處。⁵總之，羅孝全此種特立獨行的風格已難於為其他傳教士所接受，而他與差會間的關係，也經常處於不穩定的狀態。

³ Margaret Morgan Coughlin,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2), p. 76.

⁴ 哈喇(A. F. Lindley)著，王維周等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201。

⁵ 當時贊臣牧師曾多次致函差會，強力批評羅孝全的宗教信念與行事風格。維爾登牧師甚至曾寫信檢舉羅孝全在廣州教會中的帳目上虛報不實。參照 Pruder George Blackburn, *Issachar Jacob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h. D 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7), p. 164.

參、1847 年羅孝全與洪秀全在廣東的相遇

羅孝全與太平天國領導人的關係，可追溯自 1840 年代。洪秀全於 1847 年曾在羅孝全的指導下，研習基督教的教義，這些經驗對日後太平天國曾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此擬探討羅孝全在 1847 年結識洪秀全時的印象，並對以往兩岸學者關於此問題的研究重新作一審視。

洪秀全早年因屢試不第，加以受到梁發所著傳道書《勸世良言》的影響，而與馮雲山、洪仁玕潛心研習基督教義，並決心向世人宣講崇拜偶像之罪與信靠真神上帝的重要。1844 年，他從廣西返回花縣，繼續於家鄉從事教書和傳道，並陸續著有《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和《原道醒世訓》等作品。學者多認為《勸世良言》的內容對當時在科場失意的洪秀全有很深的啓示，但此書引述的《聖經》內容，有語意不詳、意義難明等缺失，因此洪秀全為進一步瞭解基督教義，也期望向人請益，並直接閱覽《聖經》全文。⁶而羅孝全在廣州的傳教活動，正好為他提供一個良機。1845 年，羅孝全的教堂「粵東施蘸聖會」在廣州東石角正式成立。至 1846 年底，洪秀全得知羅孝全在廣州傳福音的消息後，便萌生前往廣州向其問道之意。當時羅孝全亦獲悉洪秀全自行傳道的經歷，而委託其助理周道興致函邀請他來廣州協助宣教。因此，在次年 3 月洪秀全即偕同洪仁玕從花縣來到羅孝全的教堂。當他們來到

教堂之初，即各呈交了一份自述，洪秀全曾於其中詳述自己獲得《勸世良言》和信仰上帝的經歷，以及病中所見的異象。後來羅孝全在寄給友人的信中曾表示：這二份自述的內容「讀後使我確信主已樂於感化他們的心，使他們拋棄偶像來尋求救主。……其中一位的陳述簡直和羅馬百夫長科爾乃略（Cornelius the Centurion）⁷所見的異象差不多，若是在使徒時代，我就會用聖經的語言坦白地說，他見到天使的景象，天使們向他指示一些事物。……他已學到的是，偶像崇拜是錯的，所以他很快就拋棄了偶像，並教別人也這樣做。」⁸他在信中盛讚洪秀全與洪仁玕的到來，認為此係傳道時意想不到的鼓舞。由此可知，洪秀全在此時所述之異象，應未包括後來所宣稱的上帝之子和耶穌之弟的說法，否則羅孝全在此信中不可能對二人有如此高度的讚美。即使洪秀全後來可能曾向羅孝全表示，他在異象中親見的長者應為「上帝」，但以羅孝全的立場，此種說法必然無法成立。因為根據基督教義，上帝是無形的，因此洪秀全在異象中所見的長者必不可能是上帝。筆者由目前所能閱覽到的各項史料加以綜合分析，認為在 1847 年時，羅孝全其實並未否認洪秀全所見異象的真實性，當時他認為洪秀全很可能是

⁷ 科爾乃略又譯為哥尼流。《新約》〈使徒行傳〉第十章記載，該撒利亞人哥尼流為義大利營的百夫長，他和家人都虔誠地信仰上帝。某日他曾在異象中看見天使降臨，並指示他派人至約帕請彼得前來，彼得抵達後即向眾人宣傳耶穌的真道，並為他們施洗。

⁸ *Baptist Banner and Western Pioneer*, XIV: 30 (July 29, 1847), p. 118. 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第 86 號（北京：新華書局，1994 年），頁 57-59。

⁶ 伍錦源，〈傳教士對洪秀全及太平天國之影響〉，《中國研究》3 卷 5 期，頁 55。

受到天使的感召，而期望皈依上帝，此因為《聖經》之中也曾多次記載上帝差遣天使向人類宣達旨意的相關紀錄。⁹至於洪秀全容或曾將在異夢中所見的老者疑為上帝，但直到洗禮的考核前，他似乎並未堅持此議。因為以羅孝全對洗禮的重視，若是在洪秀全執意堅持「上帝有形」與個人神聖使命的情況下，羅孝全應不可能同意為他舉行洗禮的公開考核。¹⁰

至 1852 年羅孝全在得知太平軍起事的消息後，再度回憶了 1847 年洪秀全在廣州向其學習基督教義的往事，他曾在《中國傳教收成》(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刊物的文章中指出當時洪秀全曾「詳細描述了他所見到的異象，並說這種異象使他更加相信書中所論述的內容。他在描述異象時所提到的部分情節，無論在當時或現在，都令我感到迷惑。不知道他對於聖經既然沒有較廣泛的認知，是從何處得到這些見解。」¹¹許多研究太

平天國史的學者曾根據這份史料來推論，當時羅孝全認為洪秀全對《聖經》的瞭解頗為有限，且其宗教認知與正統的基督教義不合，至於其所述夢中異象更令羅孝全留下不佳的印象。筆者認為，長期以來學者多認為羅孝全對於洪秀全最初並無良好印象之故，係因引用簡又文在〈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中關於上述史料的譯文，而對於羅孝全當時的態度產生誤解。¹²例如羅爾綱、茅家琦等多數學者曾據此判斷羅孝全對洪秀全的第一印象不佳，且指出因洪秀全對異象之陳述異於正統的基督教義，而未允許其通過洗禮的考核。事實上，由羅孝全在 1852 年回顧此事的記載中，並無法斷定他對洪秀全關於異象的自述有過任何負面的評價，他之所以對此感到迷惑，主要是因為他認為洪秀全的夢中異象係源自《聖經》，但洪秀全本人對《聖經》的認知又有限，因此他難以瞭解洪秀全何以能夠作出如此的陳述。若再對照 1856 年羅孝

⁹ 依據基督教神學的觀念，天使為上帝所創造的僕役，受到上帝的差遣，向人類宣達上帝的旨意。例如《新約》〈馬太福音〉第一章即記載耶穌誕生前，馬利亞受聖靈感動而懷孕時，天使即曾在約瑟夢中顯現，吩咐其仍應迎娶馬利亞，後又相繼在夢中告知帶領聖嬰與妻子逃往埃及，躲避當時希律王的迫害。

¹⁰ 依據浸信會的神學觀念，信徒受洗只有通過全身浸於水中的浸禮才能表徵與基督同死、同復活的意義，其象徵了新生命的誕生和成為基督門徒的承擔。羅孝全於 1844 和 1847 年寫給郭士立的信函中曾描述了他為信徒受洗時的虔敬心情。他認為，信徒的皈依之心和虔誠之情皆能在洗禮的儀式中充分流露，他曾讓準備受洗的信徒「模仿基督的受難與被埋，完全沉浸於空曠的深水中」，再模仿基督耶穌的復活，令他們起身。

¹¹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London: February, 1853), p. 67. M. E. Clark and J. S. 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aiiping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p. 32.

¹² 按簡又文所譯原文如下：「當洪秀全初來我處時，曾寫了一文詳述其得《勸世良言》之經過，及其得病情形與病中所見異象，一一詳述，又謂夢中所見者與書中所言兩相證實。在述其異夢時，彼之所言實令我莫名其妙，迄今仍未明其究何處得此種意見，以彼對於聖經之知識無多也。彼請求受洗禮，但未得吾人滿意於其合格之先，彼已往廣西而去矣。」此文即為 1852 年羅孝全發表於《中國傳教收成》刊物之文章，譯文篇名則為簡又文所訂。長期以來，太平天國史學者多根據此段中譯史料以論證羅孝全對洪秀全的早期印象不佳。至於羅孝全述及洪秀全異象的原文則為：「He told some things in the account of his vision which I confess I was then at a loss, and still am, to know whence he got them without a more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scriptures.」

全於《普特南月刊》(Putnam's Monthly)所撰〈太平王〉(Taiping Wang)的內容，亦可得出相似的結論，當時羅孝全回顧洪秀全在自述中曾「介紹個人的家世、出生地、教育情況、理念與前來學到的原因。其中亦詳述他於數年前在廣州獲得一本名為《勸世良言》的書籍。他認為，後來在病中所見到的景象，證實了他從書中所獲知的信仰，他也因此成為一名追求真理和更完善知識的問道者……。」¹³ 至於羅孝全當時的態度，則是「認為他的情況相當特殊，也難以理解何以致此。」¹⁴ 由此段史料亦可知，1856 年羅孝全雖已瞭解太平天國的宗教與正統基督教義有相當程度的差異，但在回憶 1847 年洪秀全的往事時，亦無對洪秀全當時所陳述的異象及問道經過有任何不良的印象或批評的言論。基本上，羅孝全在 1852 年與 1856 年的回顧，皆反映他對洪秀全在未完全理解《聖經》內容的情況下，所提及的異象卻與《聖經》內容的記載相似，而感到相當驚訝與不解。

在探討羅孝全對洪秀全與洪仁玕在廣州時期的印象方面，前述羅孝全在 1847 年致浸信會友人的信函應屬最接近最初史實的描述，羅孝全在信中不僅對他們的自述感到滿意，更對他們的未來充滿高度的期待，指出「他們每天都在這裡學習，我幾乎相信是主送他們來這裡的，如果這樣，他們不久後就會加入我們的教會。屆時，福音將會傳播到他們的家鄉，據他們說，那裡有不少人已經廢棄了偶像。……此二人是我今年遇到的首批問道者，在迄

今我聽說過的所有中國人的經歷中，他們自述的那些經歷是最令人滿意的。我相信，這可能是聖靈感化這個蒙昧民族的開端。」¹⁵ 此信函的內容，無疑反映羅孝全在初識洪秀全與洪仁玕時，已將他們視為難能可貴的問道者，且期望二人能受洗成為正式的基督徒，並繼續致力於福音的宣揚。

洪秀全在教堂研讀基督教經典一個多月後，期望能夠接受洗禮。此時，洪秀全所想走的道路，顯然是加入教會和宣傳福音，而非後來的革命之路。根據洪仁玕的回憶，羅孝全教堂中的兩位黃姓助理，因擔心洪秀全可能會取代他們的職位，而刻意告其應主動向教會要求每月的津貼。當時羅孝全曾選派中國籍的教會成員組成一個委員會，以審核洪秀全要求受洗的事宜。委員會為瞭解洪秀全過去的背景與信仰狀況，遂前往花縣拜訪洪秀全的親友。他們在提出的報告中也認為洪秀全昔日關於異象的自述及反對偶像崇拜的活動，應皆為真實的情況，內容中並無對洪秀全有任何不利的報導。而羅孝全本人在得知後也相當滿意。在他受洗之前，教堂舉行了公開的考核，當時羅孝全曾申明加入教會與求職或薪俸報酬絕無關聯，但洪秀全則表示自己經濟情況拮据，擔心加入教會後將沒有生活來源。因此，羅孝全即懷疑洪秀全受洗的動機不純正，故宣稱洗禮將無限延期。¹⁶ 關於羅孝全最後未核准洪秀全所提出的受洗事宜，學者們對其中原因亦

¹³I. J. Roberts, "Taiping Wang," *Putnam's Magazine*, VIII (October 1856), p. 381.

¹⁴ 同上註。

¹⁵ *Baptist Banner and Western Pioneer*, XIV: 30 (July 29, 1847), p. 118.

¹⁶ I. J. Roberts, "Taiping Wang," *Putnam's Magazine*, VIII (October 1856), pp. 382-383.

持有不同的看法。過去學者多依據簡又文所譯《太平天國起義記》推論，羅孝全因閱覽洪秀全關於夢中異象及個人神聖使命的陳述，故認為他對正統基督教義的認知極為敷淺，甚至懷疑其可能曾受到異教的煽惑。此種觀點雖長時期為學者所採納，但我們由前述 1847 年羅孝全致友人的信函仍可論證，此次洗禮延遲的原因，應與洪秀全所可能懷有的異端思想無直接關聯。而洪秀全在當時對羅孝全所透露的天啓與個人使命，應是自己將成為一名傳道人，並帶領中國民眾皈依上帝的信仰，而不是領導群眾走上革命的道路，建立一個以上帝信仰為依歸的新國度。事實上，這些變化主要是在 1848 年他返回廣西以後才發生的。

總之，在洗禮的考核結束後，洪秀全對於申請受洗未獲核准，感到相當失望。由於在廣州生活無著，又不知何時才能再受洗，他遂決定離開廣州，去廣西與馮雲山會合。此後，洪秀全無論在事業與信仰上，均開始邁向新的道路。¹⁷ 至於洪仁玕則於廣州學道一個多月後，即已先離開廣州，後於瑞典籍牧師韓山文（Theodore Hamberg）處學習基督教義，並曾於上海倫敦傳道會工作。而在此期間的閱歷，則對其往後在太平天國的作為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至於洪仁玕後來留於韓山文住處的關於太平軍起事的資料，不僅使羅孝全在閱覽後回憶起 1847 年的往事，更令他對太平天國產生極大的熱誠，且頗思加入這場西方人士所認知的基督教化的運動。

¹⁷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406。

至於 1847 年時羅孝全本人對洪秀全的離開似乎並未相當重視，此因當時粵東施蘸聖會曾遭到當地土匪的劫掠，羅孝全正忙於處於善後事宜，而無暇顧及洪秀全出走之事。

肆、羅孝全對洪秀全的宗教影響

由當代相關的研究可知，許多學者皆認為洪秀全在廣州學道時期對基督教的認知，多與他昔日從梁發傳道書《勸世良言》中的內容類似，包括皈依獨一的真神上帝、反對偶像崇拜與異教信仰等，因此對他在向羅孝全學道期間所受到的宗教影響，即較容易忽略。根據羅孝全的回憶，他曾教導洪秀全基督教與《聖經》的知識兩個多月。¹⁸ 洪秀全在學道期間接受的課程，包括參加聖經班，默記與頌讀《聖經》，在班上每日聽講二小時等，¹⁹ 也使他加深了對基督教義的瞭解，雖然此種理解就整體而言仍屬有限，但亦在宗教方面對日後的廣西上帝會與太平軍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在此擬將這些影響分為神學理念、宗教儀式、傳教的態度與方式等層面加以探討。

一、宗教理念與儀式

前曾述及，羅孝全在洪秀全提出洗禮的申請後，因懷疑他要求受洗的動機不

¹⁸ 洪秀全在羅孝全教堂學習時，所閱讀過的主要傳道書包括《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耶穌聖書》、《真理之教》與《問答俗話》等。參照 Boardman Eugene Power,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pp. 144-145.

¹⁹ I. J. Roberts, "Taiping Wang," *Putnam's Magazine*, VIII (October 1856), p. 380.

純，而將洗禮無限延期，終使洪秀全黯然離開廣州。洪秀全返回廣西之後，在宗教理念上也逐漸產生變化，但在羅孝全教堂二個多月的學習，對他仍有相當的影響。在宗教理念上，羅孝全的神學觀念是屬於傳統基本主義的正統派，將其他宗教均視為異端與邪教，並全力抨擊當地的偶像崇拜。反觀洪秀全在接受上帝信仰初期，雖也對佛、道教產生排斥，但是未有大肆毀壞寺廟偶像之舉。至 1847 年返回廣西後，即屢有破壞寺廟偶像及排斥民間神祇之事，此舉雖含有政治目的，但在宗教理論上很可能是在廣州學道時受到羅孝全基本主義的影響。關於此點，美國學者濮友真（Boardman Eugene Power）在《基督教對太平天國思想意識的影響》（*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中曾指出：

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新教來華傳教士，與二十世紀的傳教士相較，在理念上更傾向於基本主義。洪秀全在向羅孝全學習聖經之時，他體會到的是一個美國南方浸信會傳教士的理念，此種理念是將其他一切宗教視為異教，也可能是邪教。此時期出版的基督教傳道書，皆代表如同羅孝全之類的傳教士所宣傳的理念。……似乎像他一樣的傳教士，皆致力於攻擊本地的偶像崇拜並傳播基本主義的信條。²⁰

上述關於洪秀全所受基本主義影響的觀點，亦為簡又文、羅爾綱與王慶成等學者所接受。濮友真曾考察羅孝全在從事佈

道工作時所發送的福音小冊，發現其中實蘊涵濃厚的基本主義色彩，而攻擊偶像崇拜的謬誤則為其思想核心之一。雖然部分學者認為此種反對偶像與排斥異教的觀念，大致與洪秀全由《勸世良言》所得者相同，但若比較其在離開羅孝全教堂後所從事的反異教運動，其激進之程度實過於以往。由此可知，羅孝全的宗教指導，除了使洪秀全得以印證昔日由《勸世良言》所得之知識外，更加深其反對中國民間宗教及偶像崇拜之信念。事實上，洪秀全最初曾透過《勸世良言》而間接瞭解《聖經》的內容，該書引用的經文主要是根據馬禮遜的譯本《神天聖書》，其對洪秀全的影響層面包括了原罪觀、獨一真神論、耶穌復活升天的事蹟、反對偶像崇拜、天堂永生，以及世人皆為上帝兒女亦同處於平等地位等觀念。1847 年，洪秀全在羅孝全教堂所從事的活動主要即為研讀《聖經》，這是他首次直接閱覽《聖經》的原本，在離開廣州後，他也透過得自教堂的《聖經》以宣揚上帝的真道。太平天國官方文獻《太平天日》即記載：洪秀全在廣州時「與花旗番羅孝全共處數月」，並且「將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細覽。」²¹至於所閱讀之版本為英王詹姆士一世欽定《聖經》的郭士立譯本。大陸學者茅家琦則由洪秀全在赴廣州學道後所著《原道覺世訓》的內容，歸納出羅孝全對洪秀全的宗教影響，可包括三點：一為根據聖經的內容，論證世界的主宰為皇上帝而非閻羅妖；二為藉由聖經的故事論證偶像崇拜的謬誤；三為根據

²⁰ Boardman Eugene Power,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p. 52.

²¹ 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國》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646。

聖經譯本將上帝譯為「皇上帝」，論證世俗君主不得稱「皇」或「帝」。²²此三項論述主要即在強調洪秀全於羅孝全處學習《聖經》後所得到的新啟發，及將之運用於上帝教理念的情況。

此外，羅孝全在廣東浸信會的教堂規章，對洪秀全日後為會眾所訂定的規範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當時羅孝全在〈粵東施蘸聖會例式〉中曾明訂十三條信徒應當遵守的規範，分別為：

- 一、凡信耶穌，首領蘸禮得入聖會；二、上帝獨一真神，耶穌獨一救主，凡拜別物者必定見罪；三、聖書由神天來，道理有真無假；四、聖神洗人心，令人曉真理；五、順真理者享永福，逆真理者獲永禍；六、食鴉片者當出聖會；七、講假話者當出聖會；八、凡賭錢者當出聖會；九、耶穌門生當相愛如兄弟；十、耶穌門生當日日讀聖書、求神天；十一、凡禮拜日有做生意、做工夫者當出聖會；十二、耶穌門生當專心相輔傳福音；十三、吾等信此道理有真無假，依賴耶穌之功，應許受此規矩者宜簽名。

23

在上述教堂章程中對信徒所訂立的道德規範，在《太平官書》所記載的「十天條」中即有相當程度的反映。「十天條」為日後上帝會與太平軍用以規範信眾行為的法則。例如羅孝全曾凡規定吸食鴉片者不得繼續加入教會，而洪秀全後來亦在第七條嚴禁上帝會的會眾與太平軍吸食與販賣

鴉片，違者被視同與通奸罪相關，可處以極刑，即連吸煙草者亦將受到處份。²⁴

1847年洪秀全在羅孝全的浸信會教堂學道，是其首次與唯一的接觸正式基督教會的經歷。在此期間，他對教會的組織與宗教儀式，也獲得了初步的認知。在教會組織方面，太平天國在「天朝田畝制度」中曾規定，全國的村鄉每二十五家應設立一所禮拜堂，其淵源即在此。²⁵甚至連羅孝全廣州浸信會教堂內部的陳設形式也成為後來太平天國設立禮拜堂時的重要參考。²⁶但另一方面，也由於此時教堂的信徒不多，組織較為簡單，故洪秀全所知悉的教會組織制度自然也有限。

在宗教儀式方面，在未遇到羅孝全之前，洪秀全曾將「上帝」二字書於紙上作為崇拜，並用柱香和金紙進行禮拜。當他瞭解這是錯誤後，便立即將此儀式取消。因羅孝全認為「崇拜」僅能對上帝而言，洪秀全後來即禁止信徒在文書上使用「拜」字。在浸信會教堂時，洪秀全亦習知基督教的「禮拜日制度」，後來他沿用「禮拜」名稱並明定為「天曆」中的制度，然因編制曆書時之誤，而將西曆的週六視為週日。²⁷在聚會活動方面，上帝教的信徒在禮拜聚會時，通常會唱讚美詩來敬頌上帝，講道的主題也是以上帝的憐憫與耶穌

²⁴ E. G. 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London, 1855), pp. 384-391. M. E. Clark and J. S. 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aiping*, p. 67.

²⁵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8年），頁1976。

²⁶ 伍錦源，〈傳教士對洪秀全及太平天國之影響〉，《中國研究》3卷5期，頁57。

²⁷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冊，頁1717。

²² 茅家琦，《太平國對外關係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82-283。

²³ 羅孝全，〈粵東施蘸聖會例式〉，收入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頁479-480。

的賜福為中心，然後訓誡世人要對自己的罪過懺悔，禁拜任何偶像，並且以誠摯的心來信仰上帝。當信眾開始禱告時，則會由一位代表來吟誦禱告詞。²⁸ 至於參加禮拜活動的弟兄姊妹，雖一律平等，但必須按性別分座，此亦為仿自廣州教會為適應中國習俗而採行的措施。此外，在讚美詩的應用方面，上帝會在禮拜聚會時皆有各種詩歌的吟唱。洪秀全後來雖然並未認同基督教關於「三位一體」的教義，但其在廣州學道期間向羅孝全所習得的「三一頌」，後來卻在太平天國境內廣泛傳頌。1853 年美國衛理公會傳教士戴作士（Charles Taylor）在訪問當時由太平軍控制的鎮江期間，曾記錄了他們在晨禱時吟唱的讚美詩〈三一頌〉，其內容為：「讚美上帝為天聖父，讚美耶穌為救世聖主，讚美聖神風為聖靈，讚美三位一體為合一真神。」²⁹ 此與羅孝全在廣州傳教時所使用的讚美詩極為類似，明顯係受其影響。³⁰ 而洪秀全在天王府召見諸王的儀式中，所有參與者在大殿內亦會齊聲吟唱〈三一頌〉。此即顯示洪秀全在離開廣州後，仍相當重視昔日在羅孝全教堂所習得之部分教儀，並將其融入上帝教的儀式中。不過仍有部分重要儀式，如洗禮與聖餐禮等，因

係洪秀全所未曾經歷者，故在後來上帝教之中即與正統基督教有所歧異，或是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二、傳教的態度與方式

洪秀全對於接受洗禮原本懷有高度的期望，卻因受到教會助理的排擠而落空，此種挫折感也影響到他日後的傳教態度。因為對期望成為正式信徒的問道者而言，洗禮的意涵與重要性是神聖而崇高的，更象徵成為一位傳道人的基本資格。洪秀全以真誠的態度提出洗禮的申請，卻受到教堂助理的排擠而告落空，因此在離開廣州後，遂萌生了不假外國人之手而獨立傳道的意念，且不容外國傳教士動搖上帝教的核心價值，而此種意識在日後傳教士與太平天國交流的過程中也一再充分表露。³¹ 例如 1861 年洪仁玕曾對來訪的英國傳教士表示，天王對於傳教事宜「不願依賴外授，他認為中國人自己即可完成此事。」³² 此外，前曾述及羅孝全在宣教態度上具有高度的自主性，他行事獨斷，熱衷於獨自外出講道與散發福音書刊，且極為不願受到差會或其他傳教士的指使。由此可見，洪秀全此種堅定的自主傳道信念，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能是受到羅孝全的影響。

至於在傳教方式上，在廣州學道的經驗後來曾給予洪秀全不少啟示。無論是廣西上帝會與後來的太平軍，在傳道方式上皆有許多方面係仿效基督教傳教士的佈道工作。首先，基督教牧師於講壇中的「證道」，當時在廣州又稱為「講道理」。而洪

²⁸ 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台北：華興文化事業中心，1983 年），頁 6。

²⁹ Charles Taylor, *Five years in China* (Nashville, 1860), pp. 339-360. M. E. Clark and J. S. 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aiping*, p. 75.

³⁰ 《天條書》記載浸信會〈三一頌〉的內容為：「讚美真神是聖父爺，讚美耶穌救世聖主，讚美聖神風是聖靈，讚美三位是一聖神。」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冊，頁 1975。

³¹ 陳澤宏，〈洪秀全羅孝全關係研究〉，《學術研究》第 11 期，頁 93。

³² 茅家琦，《太平國對外關係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頁 381。

秀全於返回廣西後，上帝會與太平軍中亦有舉行「講道理」的活動，不過此雖是模仿教會牧師的證道，但其宣講內容並非全為《聖經》道理，而是混合了宗教訓誨與政治宣傳。在廣西上帝會時期，除了由洪秀全與馮雲山等領導人以口頭方式「講道理」之外，為加強宣傳效果，他們亦將宣講內容與所撰詩文由信徒抄錄分送各地。觀羅孝全在傳教活動上對散發福音書籍之重視，即不難發現洪秀全從他那裡所受到的影響。及至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亦雇匠刻印及刊行多種宗教書籍，並將之廣泛分送予太平天國的臣民閱覽。費熙邦(E. G. Fishbourne)即曾記載，當時天京「計有四百人不停地從事複製郭士立《聖經》譯本的工作，並免費散發《聖經》。」³³事實上，此種大量且免費分送《聖經》和宗教書籍的傳教方式，很明顯是承襲自他在向羅孝全學道時期的經歷。³⁴

由上述可知，廣西上帝會與日後的太平軍在宗教觀點、儀式與傳教方式中的許多特色，很可能是受到了羅孝全教會的影響。然而，上帝教的教義雖包含了部分基督教義，但其核心部分仍為洪秀全的新啓示與「天父天兄下凡」的事蹟，此亦為太平軍鞏固統治與凝聚會眾向心力的精神基礎，而這在往後傳教士與太平天國的交往中即造成了相當大的阻礙。

伍、結論

³³ E. G. 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pp. 384-391. 夏春濤，《太平天國宗教》（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1992年），頁91。

³⁴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下冊，頁1712-1713。

羅孝全與洪秀全的初期交往，曾長期受到學者的重視，但過去許多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仍有值得商議之處。本文旨在說明羅孝全在1847年時對洪秀全的印象頗佳，且認為其所陳述的夢中經歷應屬天使的異象，至於他後來不肯為洪秀全施洗，係因懷疑其心存經濟目的之故。而在廣州學道的經驗，對洪秀全日後的宣教理念與態度亦有重要的影響。

至1852年，羅孝全在獲知太平天國的領導人為洪秀全後，曾認為太平軍是在進行一場基督教化的運動，並熱烈期望能前往南京推展福音事業。然而，他並未瞭解當時洪秀全的宗教思想與1847年時已有顯著的差異，因此羅孝全雖於1860年順利往訪南京，但雙方在宗教觀上的碰撞，包括三位一體的教義、基督論、洪秀全新天啓的真實性、教會觀等問題，³⁵後也成為1862年羅孝全憤而離開南京及大肆抨擊太平天國的主要原因。

陸、參考文獻

一、中文著作與史料：

王立新，《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王慶成，《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北京：

³⁵ 羅孝全堅持上帝、基督與聖靈各有獨立的位階，且同尊同榮，強調基督的救贖與復活，質疑洪秀全的新天啓有違《聖經》的訓示，並認為教會的最高領導應為基督。至於洪秀全則認為聖父的位階應高於聖子和聖靈，強調自己曾由上帝那裡獲得新啓示，且可用於修正《聖經》的內容，而天父、天兄、天王本人與幼主則為教會的共同領導。

-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
- 中國社會科學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代史資料》，第 86 號，北京：新華書店，1994 年。
- 哈喇 (A. F. Lindley) 著，王維周等譯，《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年。
- 吳義雄，《在世俗與宗教之間—基督教新教傳教士在華南沿海的早期活動研究》，廣州：廣東出版社，1997 年。
- 茅家琦，《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夏春濤，《太平天國宗教》，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 鄧元忠，《美國人與太平天國》，台北：華興文化事業中心，1983 年。
- 簡又文，《太平天國典制通考》，共三冊，香港：簡氏猛進書屋，1958 年。
- 羅爾綱、王慶成主編，《太平天國》，第九、十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
- 羅爾綱，《太平天國史》，共四冊，北京：中華出版社，1991 年。

二、英文著作與史料：

- Boardman Eugene Powers, *Christian influence upon the ideolog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1-1864*,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2.
- I. J. Roberts, "Taiping Wang," *Putnam's Magazine*, VIII (October, 1856), pp. 380-383.
- I. J. Roberts, "A letter from I. J. Roberts, Canton, October 6, 1852," *Chinese and General Missionary Gleaner* (London: February, 1853), pp. 67-69.

Teng Ssu-Yu,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Reprinted in Taipei, 1972.

F. Michael and Chung-li Chang ed., *The Taiping Rebellion: History and Documents*. Se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71.

M. E. Clark and J. S., Gregory ed., *Western Reports on Taiping*,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82.

三、中文期刊論文

王慶成，〈洪秀全與羅孝全的早期關係〉，收入《太平天國的文獻與歷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 年，頁 398-425。

伍錦源，〈傳教士對洪秀全及太平天國之影響〉，《中國研究》3 卷 5 期，1997 年，頁 51-59。

陳澤泓，〈洪秀全羅孝全關係研究〉，《學術研究》271 期，2001 年，頁 90-95。

楊碧玉，〈洪秀全政治人格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年。

四、英文期刊論文

Pruder George Blackburn. *Issachar Jacox Roberts and American Diplomacy in China During the Taiping Rebellion*. Ph.D 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1977.

Margaret Morgan Coughlin. *Strangers in the House: J. Lewis Shuck and Issachar Roberts, First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ies to China*. PhD Dis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1972.

Y. C. Teng. "Reverend I. J. Roberts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 *Journal of Asian*

明道學術論壇，2(1)：1-14 (2006)

Studies, XXIII-1 (Nov. 1963), pp. 55-67.

I. J. Roberts' Impression and Influence upon Hung Hsiu-chuan in 1847

Chan An-shen

Master's Student, Graduate School of History,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Abstract

I. J. Roberts was an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in China in 19th century. He was best known for his role as Hung Hsiu-chuan's religious teacher and hi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Taiping rebellion. Roberts instructed Hung in studying Christianity in 1847, and he had a good impression on Hung at that time. He also thought the visions that Hung mentioned were similar to angel's calling. Although Hung studied the gospel only for about two months, it had influenced the Taiping religion's comprehension and ceremony. This article will trace back to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I. J. Roberts' works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and analyzed his impression on the period of Hung Hsiu-chuan's research for gospel in Canton (Kuang-chou). Furthermore, Roberts' religious influence upon Hung Hsiu-chuan will be fully discussed.

Keywords: I. J. Roberts, Baptist, Hung Hsiu-chuan, Taiping rebellion